



■鄉城流轉
——蒙敏生攝影集
作者：蒙敏生
出版：中華書局(香港)
定價：HK\$ 88.00

■看電視

在街上看電視是那些年的生活情趣。電視機是戰後的新生事物。在那個年代生活過的市民，都會記得家裡添置第一部黑白電視機時那種既興奮又自豪的心情。從此，方形的畫面把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徹底改變。

蒙敏生鏡頭下的香港六、七十年代

節選自《鄉城流轉——蒙敏生攝影集》

文：劉智鵬

六、七十年代的香港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大時代。香港經過戰後二十多年的休養生息，社會上積累了一股萌動的力，最終把香港改換成今天的面貌。香港從工業生產中得來的財富成為推動地產發展的資本。市區的戰前唐樓陸續消失，代之而興的是新式多層洋樓。至於曾經遍佈港九各處的寮屋亦逐漸為新區廉租屋所取代。當香港市區的地貌正在不斷增高的時候，荃灣的開發為七十年代拓展新界的宏圖打下了重要的基礎，香港百年基業的漁農社會從此走上了傳統歷史的盡頭。

這三十年的劇變，見證了香港社會從貧窮走向富裕的歷程。今天回首前塵，其中的辛酸和喜悅依然歷歷在目。難得的是，當年香港左派攝影界從記錄社會矛盾出發，號召攝影師用照片去反映低下階層的生活面貌。攝影師蒙敏生於是拿著綠來中片幅雙鏡照相機走進社會，為那個大時代的普羅大眾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記錄。

蒙敏生曾經被譽為二十世紀中期中國攝影界的「藝術先鋒」，他用所謂「觀念攝影」的手法，以表演、擺拍、置景、模仿的方式拍攝了一系列其具藝術味道的照片。他用紀實的手法為香港社會留下印記，居然一洗鉛華，充滿頹唐咀嚼的歷史韻味。

蒙敏生鏡頭下的六、七十年代香港，是今日社會的本來面目，當中的價值落差，值得當代香港人細細細想。

在變焦鏡頭尚未通行的年代裡，紀實攝影的愛好者都會記得戰地攝影大師羅拔卡柏的名言：「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好，是因為你站得不够近。」偏偏，被攝影行家刻意與拍攝的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。即使要捕捉街頭水果小販為口奔馳的辛勞，他仍然願意站在稍遠處，為販者不如意的人生片段保留一點起碼的尊嚴。我甚至覺得蒙敏生有意通過照片表達一種觀看事物的眼光和態度。事實上對於從事香港歷史研究的人來說，蒙敏生的照片乍看起來並非特別出眾。然而，當單張照片並非成系列，攝影師的苦心忽然躍於紙上。原來照相機的焦平面與焦點之間的差距並非全屬技術上的考量，這當中隱含了攝影師一種靜觀的價值取向。蒙敏生選擇了以平常心表達他對這個時代的觀感，並且以誠實的手法記錄社會的不同面貌。他的紀實攝影並非刻意追求構圖的美感，他表達的是一種直接而真實的印象。曾幾何時，新界農村和大澳漁村是香港攝影發燒友「打沙」的熱點，蒙敏生卻從中捕捉到小市民樸素的生活質感。對於蒙敏生而言，農村的美不在於墟里炊煙的田園風光，而在於農民自食其力的辛勞。蒙敏生沒有為漁夫撒網那瞬間的光影而著迷，他看到的是網中人為生活而奮鬥的堅毅。他雖然聚焦於低下階層，但他鏡頭下的香港舊社會破落而滄桑，貧窮而困乏。他也沒有過分渲染小市民在生活壓迫下的凄楚，他看到小市民辛勞的背後，是一天比一天光明的未來。

攝影技術的變遷使歷史的陳述發生了根本的變化。過去單純以文字指涉的歷史內涵有了更豐富更客觀的佐證。攝影機成為了紙筆以外的另一種歷史工具。蒙敏生不但記下了香港社會的面貌，他也通過鏡頭去思考香港社會的種種問題，他實際上是用照相機表達他對香港歷史的一種看法。蒙敏生是以照相機為紙筆的史家。

註：文中小標題由編輯添加

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投降，香港在英治政府的重新管治下翻開了歷史的新一頁。此後幾年，中國大陸的歷史變遷直接改變了香港的命運。從國共內戰到中共建國，香港是內地同胞逃避戰火和脫離貧窮的最後歸宿。他們留在香港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要活下去。十幾年之間，香港的人口從戰後的六十萬激增至一九六零年的三百萬，其中非土生居民的數字一直佔總人口一半以上。香港英治政府以有限的資源重建管治架構，實在無力全面照顧這批數量龐大的不速之客。香港居民既來之則安之，惟有自強不息，以勞力和意志換取三餐一宿的溫飽。

寮屋是香港都市化過程中同場加映的歷史。它既短暫又堅強，既得而後失，卻處處展現出強韌和創意的生命。寮屋中飽足、自強、忍讓、合作、滿足、自強、這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。

在變焦鏡頭尚未通行的年代裡，紀實攝影的愛好者都會記得戰地攝影大師羅拔卡柏的名言：「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好，是因為你站得不够近。」偏偏，被攝影行家刻意與拍攝的對象保持一定的距離。即使要捕捉街頭水果小販為口奔馳的辛勞，他仍然願意站在稍遠處，為販者不如意的人生片段保留一點起碼的尊嚴。我甚至覺得蒙敏生有意通過照片表達一種觀看事物的眼光和態度。事實上對於從事香港歷史研究的人來說，蒙敏生的照片乍看起來並非特別出眾。然而，當單張照片並非成系列，攝影師的苦心忽然躍於紙上。原來照相機的焦平面與焦點之間的差距並非全屬技術上的考量，這當中隱含了攝影師一種靜觀的價值取向。蒙敏生選擇了以平常心表達他對這個時代的觀感，並且以誠實的手法記錄社會的不同面貌。他的紀實攝影並非刻意追求構圖的美感，他表達的是一種直接而真實的印象。曾幾何時，新界農村和大澳漁村是香港攝影發燒友「打沙」的熱點，蒙敏生卻從中捕捉到小市民樸素的生活質感。對於蒙敏生而言，農村的美不在於墟里炊煙的田園風光，而在於農民自食其力的辛勞。蒙敏生沒有為漁夫撒網那瞬間的光影而著迷，他看到的是網中人為生活而奮鬥的堅毅。他雖然聚焦於低下階層，但他鏡頭下的香港舊社會破落而滄桑，貧窮而困乏。他也沒有過分渲染小市民在生活壓迫下的凄楚，他看到小市民辛勞的背後，是一天比一天光明的未來。

趙元任(一八九二—一九八二)，江蘇武進人，國際知名的語言學大師，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者之一。趙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樂，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，當地人都認他做「老鄉」。

二戰後，他到法國參加會議。在巴黎車站，他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，對方聽了，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，於是感歎：「你回來了啊，現在可不如從前了，巴黎窮了。」

一九二〇年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迴講演，趙元任當翻譯。每到一個地方，他都用當地的方言來翻譯。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學長沙話，聽到了長沙，已經能用當地話翻譯了。講演結束後，竟



■電車

乘客擠在有如罐頭沙甸魚的電車內，這是六十年代經常可見的城市現象。電車是香港最早出現的陸上大型交通工具。可以想像，當年港島北岸縱走東西的電車，其便民的程度，應該不亞於今天的地鐵。電車早期分為兩等，上層是「頭等」，下層是「三等」；前者由車頭司機旁的斜梯上落，後者的上落口則在車尾。每層設售票員一人，各自為政。乘客擠滿車廂的時候，售票員往往動彈不得，短途乘客未來得及買票就要下車。後來將上下兩層連接起來，後上落，全車由一人操作。

從1904年到今天，電車一直無間地服務香港，包括日治時期。電車雖然帶有「活化石」的面貌，畢竟還是今日香港島上的主要交通工具。



■採風

天星碼頭前一班「龍友」冒着狂風，捕捉驚濤裂岸那一剎那的震撼。打風是香港夏天的常備節目。市民的標準活動是吃罐頭、看電視、打麻將，還有採風。

節選自《民國那些人》

文：徐百柯

趙元任「好玩兒」的語言

趙元任(一八九二—一九八二)，江蘇武進人，國際知名的語言學大師，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奠基者之一。

趙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樂，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，當地人都認他做「老鄉」。

二戰後，他到法國參加會議。在巴黎車站，他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，對方聽了，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，於是感歎：「你回來了啊，現在可不如從前了，巴黎窮了。」

後來，他到德國柏林，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。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：「上帝保佑，你躲過了這場災難，平平安安地回來了。」

一九二〇年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迴講演，趙元任當翻譯。每到一個地方，他都用當地的方言來翻譯。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學長沙話，聽到了長沙，已經能用當地話翻譯了。講演結束後，竟

有人跑來和他攀老鄉。趙元任曾表演過口技「全國旅行」：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，經河北到山西、陝西，出潼關，由河南入兩湖、四川、雲貴，再從兩廣繞江西、福建到江蘇、浙江、安徽，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，最後入山海關返京。這趟「旅行」，他一口氣說了近一個小時，「走」遍大半個中國，每「到」一地，便用當地方言土話，介紹名勝古蹟和土貨特產。

這位被稱為「中國語言學之父」的奇才，會說三十三種漢語方言，並精通多國語言。研究者稱，趙先生掌握語言的能力非常驚人，因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種語言的聲韻調系統，總結出一種方言乃至一種外語的規律。

他還被稱為罕見的通才、一個「文藝復興式的智者」。作為與梁啟超、王國維、陳寅恪並稱於世的清華國學研究院「四大導師」，語言學是他着力最深的領域，然

而他同時還兼授物理、邏輯等課程。他雅好音樂，曾專攻和聲學與作曲法，會擺弄多種樂器，畢生都與鋼琴為伴。他一生創作過一百多件音樂作品，包括聲樂和器樂。他跟他的女兒們，凡有機會聚在一起，就組成一個家庭合唱團，分聲部地練習演唱他的新作或舊作。難怪人們說，音樂是他生命的組成部分。

趙元任告訴女兒，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「好玩兒」。在今人看來，淡淡一句「好玩兒」背後藏着頗多深意。世界上很多大學者研究某種現象或理論時，他們自己常常是為了好玩。「好玩者，不是功利主義，不是沽名釣譽，更不是譁眾取寵，不是一本萬利。」

趙元任曾編了一個極「好玩兒」的單音故事，以說明語音和文字的相對獨立性。故事名為《施氏食獅史》，通篇只有「shi」一個

音，寫出來，人人可看懂，但如果只用口說，那就任何人也聽不懂了。「石室詩士施氏，嗜獅，誓食十獅。是時，適施氏視，適十獅適市。是時，適施氏食，適十獅逝。氏拾是十獅屍，適石室。石室濕，氏使侍石室。石室拭，氏始試食十獅屍。食時，始識十獅屍，實十獅屍。試釋是事。」

語言學家陳原在回憶文章中寫道：「趙元任，趙元任，在我青少年時代，到處都是趙元任的影子。」少年時，他着迷於趙元任翻譯的《阿麗思漫遊奇境記》(這本是趙與之所至偶一為之，卻成就了一部兒童文學經典譯作)。長大了，想學「國語」，就用趙元任的《國語留聲片課本》當老師。後來迷上了音樂，迷上了趙元任的音樂朋友友友梅介紹的貝多芬《歡樂頌》，也迷上了趙元任譜曲並親自演唱的《教我如何不想



■民國那些人
著者：徐百柯
出版：中和出版(香港)
定價：HK\$98



■1921年，趙元任在哥倫比亞唱片公司錄製《國語留聲片》。

■趙元任1916年在哈佛大學所照正像

她》。上世紀二十年代，趙元任為商務印書館灌製留聲片，以推廣「國語」(即普通話)。有一則軼聞，難斷真假，但頗可見趙氏當年的風光。趙元任夫婦到香港，上街購物時備用國語。港人慣用英語和廣東話，通曉國語的不多。他們碰上的店員，國語就很糟糕，無論趙元任怎麼說他都弄不明白。趙無奈。誰知臨出門，這位老兄卻奉送他一句：「我建議先生買一套國語留聲片聽聽，你的國語實在太差勁了。」

趙元任問：「那你說，誰的國語留聲片最好？」「自然是趙元任的最好。」趙夫人指着先生笑曰：「他就是趙元任。」店員憤憤：「別開玩笑了！他的國語講得這麼差，怎麼可能是趙元任？」